

# 1946年批判官僚资本高潮的形成

叶世昌

**内容提要:**抗战胜利后,针对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批判官僚资本的高潮兴起。批判者有共产党人、民主党派人士、学者和少数国民党人。1946年是批判官僚资本的高潮年。本文搜集当年发表的有关文献,按发表时间次序作出要点介绍,并予以适当的评说。

**关键词:**官僚资本 买办资本 民族资本 国营 民营

“官僚资本”的名称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出现。1923年1月,蔡和森在《向导》上发表《美国资本奴隶中国的新计划》,其中说:美国资本家拟在华发展巨大实业,已组织一商行,名为中国企业公司。该公司拟在华设立多数工厂,并开办影剧场2000所,有一资本900万美金的织物公司,以周自齐为总理。又拟组织玻璃、陶器及汽车等制造公司,公司理事美国人5名,华人方面为周自齐、王正廷、张謇等8名,“这个消息就是表明中国官僚与外国资本的勾结,又是表明外国经济的侵略主义之另一种方式……(扶植一班奴性的官僚资本家如梁士诒、周自齐、曹汝霖、王正廷等,使之代替外国资本出面以掠夺中国的财富),与他们在政治上想扶植沪汉资本家的新方式是相表里的。”<sup>①</sup>

同年7月,瞿秋白署名屈维它,在《前锋》第1期发表《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其中说:外国资本主义最初本当力阻中国工业的发达,但因欲行铁路投资,且尤须采取煤铁,非有大规模的机器事业不可,“于是借款官营,千方百计自取其管理权,成就中国特有的所谓‘官僚资本’,实际上是外国资产阶级的势力。”<sup>②</sup>他将当时中国的官僚资本分成两种:“一班士绅阶级,并无经济基础而胡乱借此官营业做无本钱生意,于是发生官僚资本之第一种……此种营业最初大半是路矿”。另一种是兴办实业,成立公司的往往先归士绅阶级、官僚阶级及少数巨商,“大半仍是官商合办等类的把戏;处处惯于借政权作弊,绝不能发生资产阶级最初期所当有的纯粹的商品经济……于是有官僚资本之第二种”<sup>③</sup>。

1927年4月,马寅初批评了官吏资本主义。他认为中国政府经办企业“非特无钱,并且办也办不好,设使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必致钱入官吏的腰包,而成官吏资本主义(official capitalism)”<sup>④</sup>。

1928年七八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六大通过了十大政纲,其中没有关于官僚资本的内容,而决议的起草人正是5年前揭露中国已产生官僚资本的瞿秋白。<sup>⑤</sup>瞿秋白在六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等职,他的态度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官僚资本还在发展初期,包括已经注意到中国正在产生官僚资本的中共领导人在内,都还没有考虑到要为此拟定相关的政纲。

[作者简介] 叶世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200433。

① 《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6、227页。

② 陈铁健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瞿秋白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0、81页。

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瞿秋白卷》,第82、83页。

④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之劳农》,《马寅初演讲集》第4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43页。

⑤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4页。

1929年,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批评了官僚资本。他在“绪论”中说:国际帝国主义者开发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适合它们销运商品、投出资本、采集原料的目的,首先是发展中国的交通。“要发展交通,必需要煤和铁,要取得煤和铁,必需从事开矿,于是它们就取得了路矿权,其取得的手段,也是供给借款。在供给价款一方面,又必有交涉借款的官僚,于是一班官僚便从中渔利,自肥私囊,形成官僚资本。”<sup>①</sup>第六章第二节还有“官僚资本之形成”一目,其中说:“从来担任铁路的敷设经营的官僚,在满清为邮传部,在民国为交通部。从来政府的财政,分为财政部和交通部的两方面,关于铁路电政等项,归交通部支配,以铁路收入为担保,发行国债,募集外债,掌握财政的一部分。所谓交通系就是这样形成的,这就是所谓官僚资本家的一派,在以前由盛宣怀所代表,在以后为梁士诒所代表。”<sup>②</sup>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利用其政治特权,迅速地发展官僚资本。1943年8月周恩来在《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中说:“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具体说来,就是官僚资本(资本、土地、工具集中在极少数的官僚财阀手里)与特务制度的结合。在蒋介石身上,便是军阀、交易所老板和流氓头子的结合,他是集古今中外反动之大成的。”<sup>③</sup>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报告中说:“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sup>④</sup>这是中共领导人开始关注官僚资本问题的表现。

抗战期间,“官僚资本”还没有成为社会上的流行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1942年4月30日,昆明西南联大的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九教授联名在《大公报》发表《我们对于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1944年5月1日,其中的五教授又在《大公报》发表《我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再度呼吁》;1945年5月1日五教授(人员有变动)再在《大公报》发表《现阶段的物价及经济问题》,接着伍启元又将上述文稿等编辑出版了《昆明九教授对于物价及经济问题的呼吁》。此书对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作了尖锐的批评,但批评中并没有使用“官僚资本”的名称,而以“‘既得利益’集团”来表示,如说:“‘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是过去通货膨胀及财富集中的结果。这集团羽翼丰满之后,不但更避免负担战费,而且还用囤积垄断种种方法促使物价加速上涨,借以增加他们的财富。于是弄得物价更急速地上涨,通货更急速地膨胀,而他们的势力更为加大。”<sup>⑤</sup>另一方面,他们不用“官僚资本”名称,也同国民政府的新闻检查制度有关。抗战时期曾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的许涤新就指出过,在1946年1月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前三四年的这一段时间,凡是碰到官僚资本的字样或提到官僚资本有关的事实或攻击,总被一笔勾消!”<sup>⑥</sup>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举国欢腾。但是国民政府的接收成了劫收,以法币不等值收兑各种伪币成了掠夺民财的一种手段。官僚们大发胜利财,从而大失民心。国民党企图用武力消灭解放区,共产党除了进行武装自卫外,还进行舆论上的反击,批判官僚资本正是舆论反击中的一把利剑。这种批判符合实际,符合民心,并得到了进步学者们的理论支持。于是,1946年形成了批判官僚资本的高潮,有以下三方面的表现。

### (一) 批判官僚资本论著的数量为各年之冠

1945年12月,马寅初开始批判官僚资本,1946年批判官僚资本的论著激增。综合出版社收集有

① 《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3页。

② 《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李达文集》第1卷,第466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6页。

⑤ 伍启元等:《昆明九教授对于物价及经济问题的呼吁》,求真出版社1945年版(出版地点不明),第49页。

⑥ 许涤新:《官僚资本论》,上海:海燕书店1949年版,第146页。

关文字资料,于5月1日编辑出版了《论官僚资本》,作为“战后经济小丛书第二种”。

《论官僚资本》编者在《前记》中指出:“战后中国官僚资本……更是猖獗起来,一方面他们在购置敌产,计划国营等名义下,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另一方面为维护他们特权,保卫他们的政治堡垒,出尽死力来反对民主政治;因此,官僚资本不但是经济民主的障碍物,同样也就是反动政治的支持者。”书中作为作者署名的有方治平、朽木、赵元浩、狄超白、马寅初、邓洛夫、吴大焜、姜庆湘、郑振铎、周恩来、陶大镛、郑森禹等,此外还摘录一些相关文字。毛泽东的论述是节录《论联合政府》中关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文字,题为《毛泽东论发展私人资本问题》。周恩来的论述是节录《当前经济形势》,题为《反对三种资本》,三种资本指的是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周恩来的名字进入了作者行列,这似乎是表示周恩来对本书的出版有特殊的作用。许涤新的论述引自《谈管制政策》,其中说:“在官僚政治之下,管制政策的最大好处,是便于官僚资本的活动,因为管制的锋芒是针对于民间资本的。”<sup>①</sup>在《反对官僚资本操纵国民生计》的标题下,有引自《中共和平建设纲领》和《民盟全代会宣言》的摘录。前者有“反对官僚资本,并防止外国独占资本之操纵国民生计”等文字,后者有“接受敌人的工商业,凡应归国营者应严防贪污官吏乘机独占,借故窃取,而造成官僚资本”<sup>②</sup>等文字。节录《新华日报》的社论有两处。一是3月29日社论,其中说:“承认中国经济危机的人,必定认出一党专政,内战罪行和官僚资本的活动是中国今天的敌人,必定设法拔去这形成危机的因素”。<sup>③</sup>二是题为《新中国经济之路》,其中说:“中国将要走什么路?在政治上是真民主对不民主和假民主的斗争,在经济上是独立的自由的国民经济对官僚资本和外国独占资本所垄断的半殖民地经济的斗争”。<sup>④</sup>

## (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中发生了反官僚资本的派系斗争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此会开成了批评国民党官僚资本的会议。综合出版社的《论官僚资本》一书中,简介二中全会上萧铮、赖琏、任卓宣、吴铸人、吴绍澍、吴铁城等批评官僚资本的言论。萧铮指出国民政府经济措施失败的原因是:忽视民生主义,培养官僚资本;抗战期间统制政策失败;民营工业听其自生自灭,不加注意。赖琏指出整个经济系统陷于无政府状态,政府措施均与民生主义背道而驰,执行政策者实应负责。他还解释“官僚资本”的意义,要求官商分离,登记官吏资产。任卓宣指出财政、经济两部均未能按照六中全会代表决议,登记并限制各级官吏及公营事业从业人员的资产,彻底实行各级官吏不得经营商业的规定。吴铸人提出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官僚资本,经济部应宣布官僚资本的姓名,列为革命的对象。吴绍澍指出各地物价上涨,上海曾要求行政院成立敌伪产业处理局开仓标卖物资,是否已经实行,标卖是谁购得,必须予以调查。吴铁城提出:1. 战前各银行的小户存款,除投资放款外,多于战时移至美国。当时每法币万元购美金3 000元,现在归还存款每万元仅值5元,应另定办法使小户免受损失。2. 接收敌伪物资应迅速平价供应市场,以调节市价。3. “经济事业多失败,且有官僚资本之讥,何不将民生工业交由民营。”<sup>⑤</sup>

《论官僚资本》还收有《新华南社》的《中共评二中全会对“官僚资本”检讨》,揭露二中全会中借反官僚资本而进行的派系斗争。其中说:反动派针对经济(翁文灏)、财金(俞洪钧)两个报告,“假装关心民生疾苦与保护民营工业等,集中攻击官僚资本之弊端,与敌伪产业处理之不当,暴露了国民党的不少‘家丑’”。 “原来中国一部份官僚资本集中于法西斯反动派之手,还有一大部之集中于其他大财阀之手,这两派的官僚资本间正发生剧烈的斗争,如接收敌伪资产,金融,外汇,财政,经济等等均

① 《论官僚资本》,广州:综合出版社1946年版,第39页。

② 《论官僚资本》,第33页。

③ 《论官僚资本》,第8页。

④ 《新中国经济之路》,《论官僚资本》,第61页。

⑤ 《二中全会关于官僚资本之检讨》,《论官僚资本》,第59页。

为争执的项目……”<sup>①</sup>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党务革新方案》，以后“革新”成了国民党的一个新的口号。南京的国民党人创办了《革新》周刊，于1946年7月27日出创刊号。1946年该刊共发表了3篇论官僚资本的文章。

### (三) 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的形成

胡乔木指出：“毛主席首次提出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是在1947年底《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他说：‘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在1948年9月会议期间，毛主席解释说，官僚资本在六大以后20年中有了很大发展，我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之区别当时尚未在我们脑子里明朗。”<sup>②</sup>毛泽东作《新民主主义论》的报告是在1940年1月9日，1945年4月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报告中谈到工业的具体纲领，也还没有涉及官僚资本问题。可见1947年底把“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与1946年批判官僚资本高潮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 二

综合《论官僚资本》所收的论文，主要包含以下一些内容。

马寅初的论文有4篇，都是从演讲的纪录中摘录。一篇题为《论官僚资本》，是1945年12月23日的一次演讲摘录。演讲纪录于次日刊登于重庆《商务日报》，《文萃》杂志第14期（1946年1月8日出版）又再刊此文。这是批判官僚资本高潮到来的先声。马寅初提出要快快打到官僚资本。他说：“今天尚有另一种战争，虽隐而不见，而危害极大，这即是经济战争。此种战争如不结束，则民族资本没法发展。而官僚资本抬头，霸占一切，害国害民，难以言说。”<sup>③</sup>针对进口美援的荒唐做法，他痛心指出：“利用外资应当为我们的计划所支配，如果以外资来支配我们的计划，不但三民主义无法实现，一切亦都完了。今天的所谓国营，就是在这样掩藏中来发展官僚资本的。”<sup>④</sup>“今天要快快打倒官僚资本，发展民族事业。如果太迟了，要反对，也不可能……要反对，那末子弹，飞机都来了，什么都没办法，一切亦就完了。”<sup>⑤</sup>

一篇题为《新公司法和官僚主义》，是1946年2月4日的演讲记录，全文刊于次日的《商务日报》。新《公司法》是国民政府立法院新通过的，其中原来规定外国公司必须在其本国营业，才可以在中国境内营业。马寅初指出这对限制官僚资本的搜括是有利的。但国防会议讨论新《公司法》时，国防委员会某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徐堪以“领袖之意”删去了“营业”二字。对此，马寅初批评说：“既设本公司，当然要营业，天下岂有不营业之本公司乎”（不能删“营业”二字的理由见下段）。<sup>⑥</sup>

一篇题为《官僚资本操纵下的中国经济建设》，未注出处，笔者查到是1946年3月31日重庆《商务日报》和《文萃》第25期（1946年4月11日出版）所刊马寅初讲演纪录的摘编（题名各不相同）。马寅初指责那些官僚们“……的原则是财者首也，德者末也。二千年来都是官僚主义，升官必发财……”

① 《论官僚资本》，第60页。

②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3、544页。

③ 周永林、张廷钰编：《马寅初评官僚资本》，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130页。此引文综合出版社版未录，据《马寅初评官僚资本》书中同篇补。

④ 《论官僚资本》，第3页。

⑤ 《论官僚资本》，第4页。

⑥ 《论官僚资本》，第45、44页。

到现在呢,官僚资本控制了一切”<sup>①</sup>。他主张中国经济之路应是“‘自由民营,国营统制’,政府和老百姓澈[彻]底合作”<sup>②</sup>。他批评了国民政府在新《公司法》里加上一项“外国公司”,那就是说即使是中国人的公司,如果是按照外国法律来登记,也成了外国公司。而按美国的《中国贸易法令》,不在美营业的公司是不课税的,中国政府却又明令在《公司法》中取消“营业”二字。因此,“我要提醒起全国老百姓起来反对,这事情关系太大了……目前最紧急的是正在商谈的中美商约,我们应该起来监督政府签订商约的事情……如果就这样签了字,那就太严重太危险了”<sup>③</sup>。

还有一篇题为《要挽救中国经济危机非打倒官僚资本不可》,是4月9日演讲的片段摘录。其中说:“中国目前的经济危机情形是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物价高涨,灾荒遍地,这种情形造成,虽然原因很多,但是官僚资本的作祟,却是主要,所以官僚资本必须打倒。”<sup>④</sup>

吴大焜的《论官僚资本》,原载《经济周报》第2卷第5期(1946年1月31日出版)。他在文中指出:中国的官僚资本与买办资本并不是全部对立的,中国的一部分官僚资本,同时也就是大买办、大银行家、大地主的资本。中国的官僚资本与买办资本的不同,只是后者谋求的主要是帝国主义者的利益,获利的方法主要是依靠特殊洋人的势力;前者谋求的主要是这些官僚们本身的利益,获利的方法主要是依靠官僚的特权,在某些落后地区甚至是非常封建性的特权。官僚资本已差不多垄断了整个民族国家经济的命脉,使得整个的民族国家经济都只为这些少数的官僚利益服务,而置全国人民的死活存亡于不顾。吴大焜指出,清末的官僚资本与中国当前的官僚资本在性质上及形态上已经多少有些不同,而一贯地只为官僚本身的利益服务、妨碍民族经济发展这一点却是相同的。最后他总结说:“只要这种凭借‘特权’而在从事着非法经济活动的‘官僚资本集团’存在一天,中国就一天不能真正的走上民生主义经济建设或工业化的道路。”<sup>⑤</sup>

郑振铎的《论官僚资本》,摘自《民主》第19期(1946年2月23日出版),又见《集纳》第5期。文中指出:“要中国实现经济的民主,要中国发展国家工业和民族工业,要中国经济生活现代化,都非打倒官僚资本不可。”<sup>⑥</sup>官僚资本并不投资于生产事业和与抗战有关的工业上,做着种种投机取巧的牟利行为。其获利之丰厚,非我们意料所及。民生愈困,民族资本家愈艰苦,而他们游离的资本愈加多,投机心愈加甚。胜利以后,他们用尽了种种办法要物价上涨,以挽救自己的危机。“所以,要导中国工商业于正途,要经济民主化,要扶植民族资本的发展,必须首先扑灭那些疯狂似的投机的官僚资本和一切官僚资本家!”<sup>⑦</sup>

陶大镛的《论官僚资本》分析中国官僚资本的特点,指出它不但有封建性,而且更具有买办性。“严格说来,它是中国所特有的独占资本。它没有现代的托辣(拉)斯或卡特尔一类的独占组织,它并不是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所结合的独占资本。中国的独占资本,是通过官僚的政治机构,利用特殊的政治地位,来为所欲为的。”<sup>⑧</sup>说得干脆些,官僚资本是一切政治权力的结晶!最后他呼吁:我们要用最大的努力和全民的力量,来宣判它的死刑!

狄超白的论文有两篇。一篇题为《漫谈官僚资本》,以“在此次国民党二中全会里”开头,可见是写于1946年3月或稍后。他说:官僚资本的发展与官僚政治不可分。自革命高潮消退以后,官僚政治即逐渐抬头,至今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官僚政治有两个特点:一是遇政事则尽其推诿塞责

① 《论官僚资本》,第30页。

② 《论官僚资本》,第31页。

③ 《论官僚资本》,第32、33页。

④ 《论官僚资本》,第4页。

⑤ 《论官僚资本》,第11页。

⑥ 《论官僚资本》,第5页。

⑦ 《论官僚资本》,第6页。

⑧ 《论官僚资本》,第8页。

文饰表面之能事,二是遇百姓则尽其威吓欺诈骗污剥削之能事。数十年来,中国的国民经济逐渐破产,就是一般的商业经营,除买办资本外,亦都无利可图。唯有做官一事,莫不利市十倍,皆大发财。”对于官僚资本垄断市场从中剥削的可能性,狄超白总结为3点:1. 十余年来的官僚政治使社会财富大部集中于官僚阶级之手,得以垄断市场。2. 战时国家独占资本的发展,使一切交通工具、通讯机构都被政府控制,这对官僚资本是莫大的有利条件。3. 通货膨胀使国家银行在财政金融上获得无上的权力,一切信用贷放都辗转成为声援官僚资本活动。他指出:今天我们要清算官僚资本,必先清算官僚政治,同时亦须清算国家资本,这三者到今天已三位一体相互为用。官僚资本应列为革命的最大对象,要真正实现民主政治,彻底清算官僚政治,由全国人民的力量来打倒它!①

另一篇题为《论官僚资本与国民经济》。狄超白指出,八年抗战中,政府所有的经济建设措施,不但没有积极资助民族资本,或放任地予以自由发展,反而予以多方阻挠压迫,“抗战八年,孔祥熙氏做了将近七年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这时期是中国官僚政治达到其登峰造极的阶段,也就是断送中国民族资本,官僚资本得飞黄腾达的阶段。”②在战前,官僚资本还只集中于标金、公债及地产投资市场,很少涉足于工商业。战争发生以后,官僚资本有一部分留在沦陷区与敌伪串通合作,另一部分转移到大后方,逐渐在工商业部门活动起来。走私之风愈来愈盛,抗战的最后几年,贸易与生产已经没有沦陷区与大后方的区别,担当这两区“团结统一”工作的是官僚资本!通货的恶性膨胀也助长了官僚资本的发展。不到两三年的时间,所有商品的流通过程大都被其控制。国家银行及与官僚资本有关的商业银行,对官僚资本的发展给予了莫大的助力。官僚政治还大大扩展了公营事业。“上自中央机构下至地方机构,利用公家的飞机汽车轮船,假借公营机关的名义免税免检,而为各种大小官僚运输私货囤积私货,已成为官场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事。”③官僚资本不仅伤害了工业,而且也伤害了农业。一切农产品和农村副产品,都为官僚资本囤积操纵的对象。今年全国国民经济濒于全部崩溃破产,通货恶性膨胀与官僚资本的发展乃是两个主要凶手。最后他指出:“我们在和平建设即将开始的今天,……官僚资本不打倒,我们就无法实现民主政治,亦无法复苏国民经济,更无法建设一自由独力富强的新中国。”④

方治平的《战后官僚资本的抬头》指出,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性反而变本加厉地在发展:1. 抗战胜利了,争执了许久的50亿紧急工贷,只发了30亿,收购成品的40亿元改为收购机器。2. 大后方的国营工业也难逃关闭的命运,如果不是因为内战,大后方几十个兵工厂早就关门了。3. 天津的400家工厂被政府各部门你抢我夺地分配,“不论什么业,只要是政府有相当机关接受的,均属国有,国营的什么建设公司正以庞大的资力,向着整个中国倾压着。”⑤4. 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太平洋彼岸,救济物品、建设资金要依靠美国,连棉花也要依靠美国,照这样建设下去,则其结果必然是民间工业的毁灭与外国独占资本的发展。方治平指出:今天的危险是国外独占资本和官僚资本在中国的工业化。今天的中国,政治要民主,经济亦要民主。第一,在官僚政治肃清以前,不应让国家资本包办一切。第二,不让官僚资本发展,限制官吏经商,严禁大官僚的操纵垄断,是十分迫切的。第三,必须发展民族资本,没有民营的工业,今天中国的经济建设是不可思议的。第四,必须照顾中小工业,改善工商金融从业员的生活,设法使工人劳动者就业。

郑森禹的《官僚资本剖析》主要讲中国官僚资本的历史。他指出:“官僚资本虽然不是完全为中

① 《论官僚资本》,第13页。

② 《论官僚资本》,第35页。

③ 《论官僚资本》,第36页。

④ 《论官僚资本》,第39页。

⑤ 《论官僚资本》,第16页。

国所独有,却要算中国的特产了,也可说是中国特殊经济社会中特有的产物。”<sup>①</sup>虽然法国有官僚资本的成份,日本有较浓的官僚资本色彩,但前者不起作用,后者没有中国那样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官僚资本由来已久,于今为烈。历史上的中国达官显宦从事土地投资及国营商业贸易,其资金虽还称不上是什么资本,但后来的官僚资本就是这样演化下来的。当中国开始接近资本主义世界,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就是在拥有权势的官僚,以从老百姓身上搜括的资财及所谓“公帑”,作为原始积蓄资本而兴起的。官僚资本建立不起真正有前途的生产事业。他们在政治上建立特权,又靠这种特权把握全国经济。官僚资本常把产业资本作了土地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把银行资本作了商业、高利贷以至投机资本;把对外贸易资金作了买办资本。“说官僚资本是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决不会错。”<sup>②</sup>抗战时期,官僚资本变本加厉地室压民族资本。在“战时统制”的口实下,一切都被统制起来。官僚们还运用所谓“国营”“省营”等名称,包办了大部分企业。胜利后,官僚资本通过以下来源更加壮大起来:“一、战时已有的壮大;二、战后兼并不能自力的大后方民族工业;三、对人民新的巨额捐后摊派及侵夺;四、接收敌伪财产一部份饱入私囊;五、主要敌伪产业以‘国营’为名,官僚‘私营’是实,‘国家资本’为名,‘官僚资本’是实;六、新的投机。”<sup>③</sup>目前差不多全国所有企业都在所谓“委员会”“管理处”“局”“公司”等的变相统制经济的掌管下,沦入官僚资本手中。“要繁荣民族工业,实非打倒官僚资本不可!在充实政治的民主化之上,实行经济的民主是打倒官僚资本的前提。”<sup>④</sup>

赵元浩的《中国官僚资本的特点》指出,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官僚资本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了金融、工业、商业、交通等每一经济部门。“因此,民族资产阶级,纯正的商人,和全国爱好民主反对独裁的人民,大家都一致喊出争取经济民主,反对官僚资本的口号……如果不根本打倒官僚资本,则无从巩固中国将来的民主政治基础,也无从发展国民经济,使中国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sup>⑤</sup>赵元浩分析了官僚资本的三个一般特点和三个中国特殊的特点。一般特点为:1. 和官僚政治密切结合,血肉相连,依靠官僚政治来保障其存在和发展。2. 官僚资本的独占性与包办性,如战时卷烟,在禁止进口时,官僚资本可以用“官办”的招牌大量进口,在准许进口而要征重税时,官僚资本又可用特许证免税进口。3. 官僚资本的投机性,没有一定的经营方针,何种事业有利,就趋这种事业。特殊特点为:1. 有浓厚的封建性。抗战以后,官僚资本“不仅已经泛滥于都市里每一经济部门,且已深入农村,和大地主,高利贷者取得紧密的联络……因而高利贷活动日益猖獗,土地集中现象日趋严重”<sup>⑥</sup>。由于官僚资本和封建地主深深勾结,它对经济独占与包办的特权就掌握得更牢固,对中国经济改革也就采取更顽固的态度。2. 有严重的落后性。官僚资本的经营不是为一种经济事业的发展,不讲求人才,不讲究科学化,用人唯私,经营随便,很难获长期安定的发展。3. 具有买办性。抗战期间,官僚资本在国内代替了买办资本的地位。抗战胜利后可能两者无法分家,而成为连体的畸形儿。“因此,要中国民族资本获得发展,要国民经济走欣欣向荣的路,要中国人民生活获得逐步的改善,就必须打倒官僚资本,就必须争取经济的民主!”<sup>⑦</sup>

邓洛夫的《官僚资本在经济阵营中斗争》从三方面分析了抗战胜利以来官僚资本、中小民族资本以及民族财阀之间的复杂的斗争情况。

第一个方面,国营民营上的斗争。官僚资本想把重要的大规模敌产以国营的名义一口吞下,一般民族产业资本则在经济民主的口号下反对敌产国营,要求发给民营。邓洛夫认为:“在中国近代经

① 《论官僚资本》,第19页。

② 《论官僚资本》,第21页。

③ 《论官僚资本》,第24页。

④ 《论官僚资本》,第25页。

⑤ 《论官僚资本》,第26页。

⑥ 《论官僚资本》,第28页。

⑦ 《论官僚资本》,第29页。

济史上,今日的国营民营的斗争,可说比任何阶段来得剧烈。”<sup>①</sup>表现出来的动向大体是:统治阶级上层紧握各国家金融机关,扶植自己派系的私营金融资本集团;统治阶级上层准备拨一部分敌伪产业给民族财阀,让他们脱离“经济民主”阵线,跟官僚资本合作;把接收的部分敌产标卖,既能使资本势力较大的一方获胜,又作为拆散“经济民主”阵线的一种手段。中小民族资本家一致反对标卖敌产,他们要求委托各业经营。如要标卖,则要分期付款,而且付款要采取“渐进主义”(开始少付,以后逐渐增付)。

第二个方面,金融业经营权的斗争。对国家金融机构管理权的争夺战,从1935年后就一天白热化一天。“最初是民间的金融业巨子占上风,官僚资本虽高高在上,大权尚操于实际主持业务的巨子手中。后来,纯粹的金融业巨子也政治化起来,便展开了党系的争夺。”<sup>②</sup>抗战末期争夺尤为热烈。因沦陷区的不少金融业巨子继续活动甚至附逆,结果便使行内的大权逐渐移入党系之手。抗战胜利后争夺战并未缓和,但收复区里腾出了不少位置,更容易办理。关于私营金融机构的扶植,问题较少。这些系派金融机构,历史浅,经验幼稚,一向靠官僚势力发展其业务。他们(党系势力)有意削除收复区里那些经验丰富、善做生意的金融机构,让他们可以减少竞争者,开拓他们的独占性地盘。在这种动机下,取缔所有新银行、钱庄、信托、保险等金融业,理由是它们都在伪组织注册。同时又以附逆嫌疑彻查战前设立的商业银行,迫使这批老银行低头,或寻门路参加一系一派的金融集团。

第三个方面,货币问题上的斗争。在币制问题上,新旧财阀、大小资本自然而然地站在统一阵线,开始牺牲下层民众利益了。1. 关于伪钞敌钞的处理。平民大众希望把伪钞作价高些,上层的人则满不在乎,结果就以200中储券折法币1元的办法,使伪钞区的平民受到浩大损失(文中还分析了华北伪钞、联钞,关外伪钞,台湾伪钞的收换问题)。2. 关于黄金问题。胜利初重庆金价大跌,上层阶级支配政府决定了抬高金价的政策,定出比市价贵得多的官价。最近由于通货膨胀,金价大涨特涨。这批上层分子便废止了官价,放任金价无限制地上涨。3. 关于外汇问题。上层分子只望金价涨,汇价涨,平民大众希望物价不要再涨,主张先抑平物价,再公布汇率。最近公布的开放外汇市场等法令,就是贬值汇率为今后外汇政策的基础。

最后,邓洛夫为全文作结语说:“胜利以来反映于中国内部经济战争上的现象,乃是官僚资本的独立运动,官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运动,官僚资本与民族产业资本的斗争,及上层势力对平民大众的经济榨取运动。”<sup>③</sup>

姜庆湘的《“经济内战”必须设法禁止》主要是批评当局的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而没有针对官僚资本的问题而展开。以下仅摘录其文中的结束语:“为了解除当前的经济危机,为了加紧战后的复员和建设,我们再不能容许这个无形的‘经济内战’继续发展,……负责当局就必须立即采纳上述的建议,在以民为主的原则之下,召集全国经济界人士和学者专家们来共同研究订一个革命的经济复员建设纲领,并为这个纲领的切实执行而奋斗到底。”<sup>④</sup>

朽木的《打倒经济独裁》指出,政府今天所执行的经济政策,专为官僚军阀、买办大地主这些少数“特权阶级”的利益打算。他提出了三点事实:1. 沦陷区的经济事业,经手接收的官僚军阀个个发财。敌产、逆产你争我夺,于是宋(子文)院长飞来飞去清查敌伪产业。买办、大地主和官僚勾结起来,利用飞机运金子和货物,把关金(关金券1元合法币20元)拿到光复区抢购商品,竞买房屋地产。无论大后方与光复区,土地日益集中。2. 握有中国经济最高权力的最高经济委员会成立,除了五个

① 《论官僚资本》,第46页。

② 《论官僚资本》,第48、49页。

③ 《论官僚资本》,第52页。

④ 《论官僚资本》,第55页。



供点缀的委员外,其他都是大官。在这委员会下成立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等各式各样独占的组织。敌伪的大工厂为官僚所垄断,成为“国营事业”,剩下的小厂则拿来标售,让买办、地主,甚至拥有巨资的两栖类分点油水。在纺织公司和蚕丝公司四周,另有亦官亦商的“特权阶级”组成了各种公司,以便分别承办官营公司的各种业务,“肥水不流别人田”。3. 官僚、买办和地主的后台老板是外国资本家。他们想假借“利用外资”之名,让老板行控制中国经济之实。为讨老板欢心,他们宁愿买舶来品,不买国货。只要老板发财,不管国内民族工业崩溃,农业破产。经手的官僚买办乘机中饱,和老板们分点肥润。最后文中指出,独裁者(及其集团)幻想垄断全国经济事业,控制了全国人民的住行,就可以巩固独裁统治。他们也想利用外资来垄断全国的经济。如不改弦易辙,必至民穷财尽。要彻底改变今天的经济政策,只有赶快结束独裁政治,及早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论官僚资本》一书取文广泛,在其包含的时间段内,漏收的文章极少,笔者只查到一篇短文。为压缩篇幅,该书对所收的论文删节量较大。如郑振铎的《论官僚资本》,原文分五小节,约3 400字;收入该书时不分节,全文不到1 500字。有些论文可能原来未发表过,此书成了唯一的依据。

### 三

以下讨论1946年发表的批判官僚资本的其他论著。

1946年4月,杜岗在《礼拜六》杂志发表一篇短文《官僚资本罪恶论》,以“‘国’即是‘官’,‘官’即是‘私’”为副标题。他指出:“所谓官僚资本,就是借职务上的权力,来从事营私自肥,借‘国营’的幌子,来为少数官僚聚财。”官僚资本缺乏进取性,以专门走捷径的手段增殖财富,营私自肥是他们的特长,于是“国营”变做“官营”,“官营”实即成为官僚的“私营”。此外,官僚资本还要求尽着买办资本的作用。新《公司法》的重新修改,就是以热衷做大买办的官僚为内应的。新《公司法》规定外国公司不一定在其本国有营业,只须在其本国登记,就可在中国设立分公司。“官僚资本当可借挂外商招牌,逃避营业税以外的国税,并可再随着洋商获得别的优益。”这是转述马寅初的论点。最后杜岗强调:“要繁荣民族工业,实非打倒官僚资本不可。”

5月,《国立河南大学学术丛刊》复刊第1期发表陈方堃的《论官僚资本》。他说“官僚资本”一词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找不到,也没有经过权威学者的详细注释,因此对“官僚资本”这一范畴有予以研讨的必要。全文较长,分以下6个部分。

第一部分,官僚资本的意义。陈方堃指出,官僚资本是由资本所有者的社会地位来区分的,这种区分包括买办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华侨资本等范畴。“官僚资本本质上是封建余孽在经济上遗留的怪物,以近代化的外貌作前资本主义剥削活动的一种原始资本。”

第二部分,官僚资本的发生。清末叶近代企业萌芽时期,官僚资本就占控制地位。官僚是凭借封建特权来进行搜括事业的专家,是直接聚积人民的财富而生成的。产业资本只能借着生产过程榨取活的劳动者。陈方堃提到一些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企业,指出这些资本许多是以“国营”的名义进行的。官僚资本所依附的封建特权就是官僚主义政治,到现在已控制着国民经济的每个角落。

第三部分,官僚资本的特质。陈方堃指出:官僚资本是中国转型期中的特殊产物,有买办性和封建性。官僚资本为了保全它本身的利益而出卖民族利益,走上买办化的路程,替帝国主义推销商品和搜集原料。那些挂国营牌子的企业,在官僚资本的腐蚀下,一个个都变成外资的俘虏。官僚资本对内要与封建势力相妥协。封建社会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官僚资本狼狈结托。海禁大开以后,农业生产逐渐专业化。“越到近代,商业活动的领域越广,除了土地和生产物,各种票据,有价证券,外汇,交易所里的买空卖空,都成了商业资本高兴舞蹈的乐园”。银行资本与商业资本结合,是中国经济的特征。商业资本不断向土地资本转化,高利贷资本是其转化的中间媒介。各种不同形态的资本,都可以作为官僚资本的化身,在不同的方向进行同一的搜括事业。

第四部分,官僚资本的流毒。官僚资本是中国独占资本的具体形态。“所谓独占资本,就是独占的银行资本与独占的产业资本的结合”。这种独占的产业资本并不能抗拒外资的侵袭,却给幼弱的民族工业以致命的摧残。官僚资本的最大罪行,就是阻碍中国工业的发展,成了中国工业化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官僚资本越庞大,人民生活愈贫困,我们不消灭官僚资本,官僚资本是会吞没我们的。”

第五部分,消灭官僚资本。陈方堃指出,官僚资本如此猖獗,是出于官僚政治的庇护与怂恿,官僚政治实为元恶大愆。官僚资本是民生主义的反对物,也就是三民主义的反对物,怎能容它继续存在!消灭官僚资本不能靠官僚政治下的财政经济政策来解决。必须彻底清算官僚主义政治,然后才能运用合理进步的财政经济政策,达到消灭官僚资本的目的。

第六部分,结语。陈方堃认为,打倒官僚资本,是扫除实现民生主义障碍所必要的清道工作。民生主义的实现,须以民族、民权主义的实行为条件。“只要承认三民主义是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那末对于我们的结论——消灭官僚资本必须首先实行民主政治,便不能不认为是恰当的了。”

5月17日,马寅初作《新〈公司法〉及〈银行法〉》的演讲(刊于《经济周报》第2卷第20期)。关于新《公司法》,他再次强调取消“营业”二字的不妥,指出“这是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联系起来互相利用的结果”。<sup>①</sup>新《银行法》已拟有草案,据此中国银行业受种种束缚,简直无法营业,而外国银行则什么都可以做。5月31日,马寅初在上海大同大学演讲《论当前的经济问题》(刊于6月3、4日《世界日报》),表示自己竭力反对把“营业”二字在《公司法》里削去,但失败了。关于国际贸易,他指出:“现在的国际贸易,都被三大官僚资本的贸易公司包办去了。一个叫扬子公司,是孔家班的。一个金山公司,是宋子文办的。一家个叫立达公司,也是他们的……这就是官僚资本,不打倒官僚资本,中国经济就没有生路。”<sup>②</sup>6月6日,马寅初在《经济周报》第2卷第22期发表《农业工业与国防工业之连锁》。其中指出,日本的工商业资本,75%掌握在15个大家庭手中,银行资本50%以上操在8个大家庭手里,结果造成空前的毁灭性的惨剧。“吾之所以竭尽全力反对官僚资本者,为救农民亦为救国耳……我们要先举国一致地打倒官僚资本,增进农民福利,而后我国的实业方可向康庄大道迈进。”<sup>③</sup>同月13日,马寅初在重庆《商务日报》发表《中国经济之出路》,其中说:“我们必须避免走上官僚资本的上去。倘使我们走上了真正的资本主义的上去,那还有一点希望。但倘使我们走上了官僚资本主义的上去,那末我们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sup>④</sup>他认为官僚资本主义与真正资本主义有两点区别:一是真正资本主义的资本家,像美国钢铁大王卡纳基及煤油大王洛克菲勒等,他们的财产能积也能散,大部分财产用之于社会;而官僚资本家将财富留给子孙吃光用光。二是真正资本家的资本来源是他们自己的储蓄;而官僚资本家的资本来源于无中生有,是从大众的袋里拿出来的。

7月27日,南京的《革新》周刊创刊号出版,其中有高叔康的《官僚资本发展的形态》。他强调官僚资本是随着官僚政治而产生的。官僚资本在历史上早就存在和发展,而且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日本的资本主义就包含有不少官僚资本的成分。他说官僚资本“利用政权的便利以决定投资的方向,所以在旧社会的官僚资本的发展形态,为地主,高利贷者,商业资本家”。“官僚资本发展的形态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主流而为转移的……但它并不能辅助社会经济主流走向正当发展的途径”。中国近代大多数新式工商企业都与官僚资本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国处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已久,独立自主的意识最薄弱,所以创办工厂不如贩卖外货的利益大。因之,在现阶段的经济,官僚资本的发展形式必变为买办资本。这与历史上的官僚资本发展的形态不同,而表现为一个新的形态。他的最后结论

① 周永林、张廷钰编:《马寅初评官僚资本》,第177页。

② 周永林、张廷钰编:《马寅初评官僚资本》,第184、185页。

③ 周永林、张廷钰编:《马寅初评官僚资本》,第189页。

④ 周永林、张廷钰编:《马寅初评官僚资本》,第194页。

是：“我们固然不能照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前进，我们更不能仿效后进资本主义失败的道路走，为适应时代的要求，中国社会的需要，更显得民生主义的道路是我们唯一的一条应该走，走得通的经济道路”。高叔康只批中国历史上和国外的官僚资本，完全避开了现实的中国官僚资本。

同月，欧阳光在《金融汇报》第17期发表《论官僚资本》。他指出：官僚资本的畸形发展，及其破坏作用，显然是目前中国社会严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元月间的政治协商会议，三月间的国民党二中全会，以及四月间举行的国民参政会会议席上，曾相继提出消除官僚资本的课题，此举就国民党及社会贤达人士的立场说，可谓聪明智慧，而站在国家社会的立场说，尤为解决我国面当着的各种危机的根本良策。”欧阳光批评官僚资本的主人的人格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煊赫的官僚，同时又是投机市场的阔商人。他们既有财力，又有权势，神通广大，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他们都可以安然为之。官僚资本在外国也有。“不过欧美各国的官僚资本，在国内的出路是投资于实业生产部门，金融资本便投资于殖民地，所以其危害本国的国计民生，不像目前我国官僚资本这样厉害。”他分析了中国官僚资本的三种来源：一是旧有的军阀余孽，二是新起的少数贪官污吏，三是少数革命败类。“官僚资本的积累，有如冰地滚雪球，一转大过一转，而其危害国计民生的程度，也就一天深于一天。官僚资本家日益富裕，国家与平民，则日益贫穷，形成严重的‘分配不均’。”他又分析了官僚资本造成的种种危害，提出消除官僚资本的三种办法。1. 积极的办法。严格执行官商分开，以制止官僚资本的继续发展。没收官僚资本家（奸商同）所发全部国难财，用作开发实业的资本。2. 消极的办法。一是从速发行一种比价高于法币的货币，提高薪水阶级的待遇，扩大工业放款；二是禁止游资及商业投机资本，奖励实业生产，诱导官僚资本转入实业生产部门。3. 折衷的办法。实行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方法，课以累进重税，并提前实行官僚地产涨价归公的办法。

8月，余精一在《革新周刊》第1卷第2期发表《论官僚资本》。他说：官僚资本最显著的历史例证，为清末的盛宣怀。民国以来，北洋政府时代的大官僚、大军阀，无不以非法榨取的巨款从事商工业投机。“民十五年北伐成功后，官僚资本，蔓延渐广。廿六年抗战军兴，中央政府西迁，由于法币的贬值，薪给的低微生活的窘迫，上至高级长官，抗战军人，下至地方县长，乡镇保长，在情有可原，事非得已的借口之下，已有不小部分，利用其军事的政治的权力，向民众非法榨取物资从事商业活动。”上海的官僚资本势力雄厚，背景复杂，影响全国经济的变动至深且巨。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民主政治并不是理想的，亦包含许多黑暗面，亦有官僚资本，但他们绝不会容许官僚资本的存在与发展。“反之，中国的官僚资本，是经济贫弱的结果。一不小部分的官员，利用其权力，不恤采取违法手段，从事商工业的投机，以创造或发展其个人的资本。”余精一将中国官僚资本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前途归纳为5条：1. 促进贪污风气的发展，中国政治与法律从内部日趋腐败，行政将无效率可言。2. 官僚资本利用超经济的政治甚至军事力量，侵入经济界；正当的商工业经济除一部分相互勾结者外，决难与其竞争，只能日就枯萎。3. 官僚资本的发展，在一般的贪污剥削之外，加深加广对大多数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剥削。4. 官僚资本多集中于黄金、粮食及其他各种商业投机，绝少从事发展生产，足以助长物价的膨胀，动摇中国衰弱的国民经济基础。5. 最近又有非常巨量的官资本企图包办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足以左右国家的国际贸易政策。

10月1日，陈人白在《求真杂志》第1卷第6期发表《论官僚资本》。他首先指出，自马寅初先生于去年12月大声疾呼“打倒官僚资本”之后，引起了各方面的特别注意，官僚资本已成了“众矢之的”。他认为人们虽然发表了很多意见，但综合起来还很难得出一个明白而正确的结论。他从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个方面，官僚资本的起源与发展。先是5月19日晚，上海各经济团体在银行公会俱乐部成立联谊会，公推来沪的马寅初为名誉会长。会中，联谊会主席吴大琨提出“官僚资本的定义是什么”的问题。马寅初回答说：“我对官僚资本做不出什么定义，我只觉得官僚资本形成的过程是这样的，由官方

来提倡一种事业,这事业慢慢的入于私人之手,于是官商合办,到这事业发达以后,再把它收回官办。”<sup>①</sup>陈人白在《论官僚资本》中指出马寅初的回答只是一个断片,实际情况远不像马说的片面而简单。他提出:“官僚资本乃是资本主义时代某些落后国家的官僚政治下的产物。”此种官僚资本的起源及过程,在土耳其、波斯、中国、日本,差不多都同样经历过,只是它们往后的发展过程不同。中国因为某些特有的不利条件,始终成了官僚资本特殊发展的典型的落后国家。自19世纪中叶至辛亥革命前,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可以说全是官僚资本活动和操纵的时期。假如以后的继承者们能解除其弊害而善用之,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未始没有前途。但辛亥革命后,军阀们不但全部继承官僚资本的遗产,而且再加以发挥,建立了一些产业,以全力压抑民营事业的发生。一党专政时代,除了继承原有官僚资本的一切遗产和传统外,最大的变化就是:以“统制”之名将一切官僚资本集合和集中起来,操纵于极少数官僚们之手;把某些民营或半民营的企业完全附属于官僚资本,使民营企业也官僚化;使官僚资本普遍开展到各方面,以期垄断全国各经济部门及国民生活;企图将中国的经济命脉寄托于金元帝国,以便中国对外关系的“单元化”。这可以称之为“新官僚资本”的倾向,或中国官僚资本走进新阶段的一种特殊倾向。

第二个部分,官僚资本的现状及其趋势。官僚资本的基础是国有产业及省有、市有产业等。在“八一三”以前,轻工业方面微不足道;交通业的铁路中占着重要地位的东北铁路全为日帝所有;东北矿业全为日帝操纵,关内大冶铁矿、山东滋博矿产也绝大部分落在日人手里。那时官僚资本还不能支配民营事业,在轻工业方面更为薄弱。日帝屈服后,它的产业被我国接收,情况就大变。接收的产业,重工业约占全国的80%以上,轻工业的纺纱业约占全国的50%以上,织布业更过之。这正是中国官僚资本突然增厚而扩大起来的新基础。“这不仅仅是在我国官僚资本发展史上的一种空前的‘奇观’,而且也是全世界上一个绝无仅有的怪物!”此种官僚资本的基本作用,对外尽其买办之能事,对内加强军事专政的经济基础,务使中国人民陷于万劫不复的悲惨状态之中。

第三个部分,国营与民营的问题。陈人白指出国营与民营问题在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早在半世纪以前就已被提出了,这在客观上多少反映了一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但他又指出,主张“变民营为国营”的先生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不知道国家政权性质的不改变,将某些企业改为国营又有什么益处。辛亥革命前,中国已有国营与民营之争,那时是主张“以民营反对国营”,即以“商办反对官办”。他认为从落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律(综合律)来说,以民营反对国营的观点不见得正确。因为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来得太晚了,必须以国家的全部力量有计划地从事建设才有可能。所以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首先是国家政治的改革问题。由于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来得太晚,以民营反对国营的观点不见得正确。“落后国家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国家的全部力量有计划地来从事建设,才有可能。所以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首先是一个国家政治改革的问题……现时横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已不是什么‘国营与民营’的问题,而是怎样将‘国有产业’从官僚们的掌握里抢救出来,变成为名符其实的‘国营’问题了。”

第四个部分,怎样解决官僚资本问题。陈人白指出,官僚资本绝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与专制政治下的官僚制度紧相联系着的。必须首先解决官僚制度及其所依靠的专制政治。“国有产业”变成名符其实的“国营”了,官僚资本也就自然被送进坟墓。以所谓“民营”去代替或对抗“国营”,不但在理论上是倒退,在事实上也是空想。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是彻底解决当前官僚资本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

11月2日,叶青在《革新周刊》第1卷第15期发表《打倒官僚资本》。叶青就是前面提到的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任卓宣,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常以“叶青”为笔名发表文章。他是站在国

<sup>①</sup> 《论黄金政策与官僚资本——上海各经济团体联谊会成立记详》,《经济周报》第2卷第21期(1946年5月30日)。

民党当权派的立场上来表述“打倒官僚资本”的概念的。他说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对于财政金融经济报告之决议案》第五条第三款为：“各种官吏之不法及官僚资本之垄断，尤必须切实整饬。”从此以后，批评官僚资本的文章非常之多。他宣称“这些文章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我们对于‘打倒官僚资本’之一基本原则，有加以说明的必要”。他提出官僚资本的三个意义：“第一，官僚资本是官僚与资本家合一，即官僚即资本家，亦官僚亦资本家。第二，官僚资本是官僚底资本，即官僚自己底资本，所以是一种私人资本。第三，官僚资本是官僚利用其地位、职权、势力，而违法舞弊和借公营私所造成或发展的。”他认为三条都不能缺，而最重要的是第三条。他分析官僚资本的害处，一是障碍民间资本，使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二是腐蚀国家资本，使社会主义发展不起来；三是破坏经济政策，使经济秩序不能保持，经济建设感到困难；四是妨害财政政策，使国家财政受其影响；五是败坏政治风气，使国家政治黑暗腐败，没有效率；六是腐化社会风气，使人民道德堕落，风俗变坏。七是阻碍三民主义，使革命建国不能完成。因此，“我们要下打倒官僚资本底决心，叫出‘打倒官僚资本’底口号”。

接下来，叶青将话题一转，说有些人走到错误的路上去了，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反对官僚资本。所谓资本主义的立场就是站在民间资本的立场反对国家资本，“于是他们就拼命反对招商局和中纺公司等等，尤其是中纺公司”。他说中纺公司每月交国家100万亿元，使政府减少纸币的发行，全国人民受其利。而你们则主张把中纺公司的纱厂交给数十百个资本家，让他们每月来瓜分这100万亿元利润的资本。“所以我说你们是资本主义底代言人，一点也不错。”这是明目张胆地为人人喊打的官僚资本鸣不平。他又强调三民主义是消除官僚资本毒害的对症良药，反对官僚资本要站在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的立场。他提出了四个解决官僚资本的方法，一是政治的方法，厉行法治；二是法律的方法，惩治违法者；三是经济的方法，改革公营实业；四是财政的方法，对官僚资本征重税。从以上可见，叶青的文章是以“打倒官僚资本”之名而行反对“打倒官僚资本”之实。

10月16日，陈翰笙（时任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的 *Monopoly and Civil War in China* 在香港 *Far Eastern Surver*（《远东概览》）发表。先后有4人将其译为中文发表。最早一篇的译者笔名“小鱼”，题为“中国五大独占集团”，刊于《文萃》第2卷第11期，1946年12月19日出版。第二篇译者是任新韦，题为“中国的独占事业与内战”，刊于1947年元旦的延安《解放日报》。第三篇译者是颜寂绂，题为“独占集团与中国内战”，刊于《经济周报》第4卷第1期，1947年1月2日出版。第四篇译者是李宛，题为“经济独占与中国内战”，刊于《民潮》第5期，1947年2月出版。从时间上看，只有第一篇译文发表于1946年，就以此篇为据。

陈翰笙指出，中国的国营只对经办国营事业的那些官僚有利，而它的保持私有就只保持了那些政府官员及其家属们发财。统制完全倚仗着少数有权势的政府官员。这种国营与其说是生产社会化的增进，无宁说是国有企业官僚性的强化，适足以分散与损害生产的力量。“中国政府现行的国营政策是在摧毁各个民营的新式企业。有几个有力的官僚集团正借国营之名毫无忌惮地获取私利。它们利用军政的压力，发展自己的商业利润，它们对于商业比工业更感兴趣，讨厌民主性的方法而爱用专断的措施。”陈翰笙分析了国民政府中存在的五个派系：一是CC系，由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国民党首領们所组成；二是政学系，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为其重要分子之一；三是孔祥熙为首的金融集团；四是宋子文集团；五是蒋介石集团。

陈翰笙以纺织业为例，分析政府的专营窒息着自由经济的发展。其中指出，集敌营纺织厂成立的国营中纺公司，唯一目的是在财政上补助政府，使有关的官僚经理人员大发利市。它每天生产20支纱700包，只抵全部纺锤生产量的18%强，而产品的质量极劣。中纺公司有条件纺40支棉纱，而只用来纺20支纱和16支纱，造成了对民营工厂不利的竞争。中纺公司的业务经营完全由官僚们包办，任用私人、贪污舞弊、严重延迟成了司空见惯的事。

陈翰笙还指出中国全部官办独占事业都带有买办的性质。他将中国的独占经济同西方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作了如下的比较：“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代表资本主义经济的顶点，可是在中国，按历史说来，政府专营或国营企业只是高级官僚手上的资本积蓄，还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的过程。政府专营虽然也得有过剩价值，可是它并非得自正常的商品流通，相反的，过度的利润系得自政治压力的使用，经济上的包办系由政治独裁支持。”最后，陈翰笙总结说：“政府独占、一党专政与仰赖外国军事与财政援助已成了目前南京政府的三个主义。这三个主义恰好与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生，民权，民族背道而驰。目前中国的内战在根本上就是两集团分别保卫两套主义的斗争。”

1946年，陈伯达完成了专著《中国四大家族》（陈真、吴俊扬、何均等协助搜集资料），于10月出版。这是1946年出版的唯一的一部批判中国官僚资本的专著。四大家族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四家。由于此书的出版，“四大家族”成了关于官僚资本的流行语。书中说：“十九年来四大家族用‘官’‘商’形式，在金融、商业、工业、农业、地产、新闻、出版事业等等各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根据粗略计算，至少当在两百万万美元左右。”<sup>①</sup>1947年12月毛泽东的报告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美元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sup>②</sup>对四大家族独占财产的估计比陈伯达的估计更有弹性。因篇幅关系，对《中国四大家族》一书的介绍就不展开了。

#### 四

如上所述，1946年发表批判官僚资本文章之多，确是一个突出的高潮年。虽然也有像叶青那样明批实保之文夹杂其间，但改变不了舆论的总趋势。要补充说明的是，1946年10月，《湖北论坛》第1卷第9期还发表过王孟邻的《论原始剥削与官僚资本》，内容一般，上文未予提及。另有上海的一种小报《大光明》，在第3期（6月出版）一个版面上，发表了两篇批判官僚资本的短文，一篇为卓卓的《论官僚资本》，不到1000字；另一篇为甘人的《官僚资本简剖》，不到500字，也未予提及，但由此可见1946年批判官僚资本有广泛的群众基础。1947至1949年间继续有批判官僚资本的论著发表，1947年的作者有王亚南、许涤新、傅斯年，1948年有赵迺抟、康仲平、陈之衍，1949年有萧定山等。这是1946年高潮的继续，虽然有些批判的质量更高，但参与批判的人数则大为减少。总之，批判官僚资本，1946年具有特殊性，值得进行重点的研究。

### Formation of Climax about Criticism on Bureaucratic Capital in 1946

Ye Shichang

**Abstract:** After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 climax to criticize bureaucratic capital was started. The critics included members of Communist Party, staffs of democratic parties, scholars and few of member of Kuomintang. The criticism was formatted climax in 1946. This paper has three sections. The first is total exposition. The second is centrally analysis on the views in on Bureaucratic Capital. The third is commentary on other main views.

**Key Words:** Bureaucratic Capital; Comprador's Capital; National Capital; State-Operated; Privately Operated

（责任编辑：王小嘉）

① 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页。

②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页。